

前言

歷史寫作如雕塑：「把多餘的東西打掉」

1

我已經到了遇變不驚的年齡。《知其白守其黑——西方歷史的白與黑》從思路到完稿三年（2016-2018），積壓三年（2019-2022），交稿一年（2023）。只問耕耘不問收穫。我說的「收穫」僅指「見書」，與「見世界、見人生」無涉，大概是畢生逆向夜行吧。

歷史寫作如雕塑，「把多餘的東西打掉」。不過我的歷史寫作與羅丹的藝術雕塑根本不同，他「打掉的」是他在雕塑石材上「想像」外「多餘的東西」。而我「打掉的」是相對西方歷史發展到「機器人第三型文明」而回溯歷史中不斷淘汰掉的「羽毛鱗甲」（炫耀與掩蓋）——亦即「內部奴隸制與外部殖民地」罪惡的「掩蓋」及其救贖的「欺瞞與偽裝」。或不如說，是西方歷史「顯隱二重性」的如實記錄。

但寫作說到底終究是公共行為，總要面世「見讀者」，立此存照。林中有各種各樣的鳥，百鳥朝鳳的有、夢庄啼血的有、自己鳴叫的有，我大概屬貓頭鷹一類，與土撥鼠相應，只想塵歸塵土歸土。

2

我並不清楚自己為什麼敢寫這本書。

寫完了，最一目了然的是書中的論與史、虛與實幾乎通篇皆是，仍然敢站在西方諸神面前一吐為快，大概我有《地球人類歷史第一檔案》墊

底吧。

我是科盲，卻敢質疑西方「科學主義」巔峰——宇宙論頂層結構與物義論人工智能，因為它們仍然慣性地「以論治史」（「治宇宙史」），把「4.9%的已知」當作整全宇宙而定名「M理論」如此等等。無論它多麼龐大終究是「確定底不確定性」，確定之內外的無限宇宙是它根本不知道的。「無」的無限越界是對「有限」的絕對否定。所以我只擔心「已知宇宙」因西方「功能性知識」走向最初「去善」最終「去人」的毀滅性結局——「進化論即末世論」如影隨形。

西方經典被人崇拜得那樣多就像黑夜後的「白晝」，我卻直觀它是「白色神話」「密鑰迷宮」，信手拈來分崩離析以示眾。因為有無數死魂靈堆積如山連西方神祇都無地自容。

3

西方「哲學本體論」「神學一神論」「科學粒子論」始終如一「只知其有不知其無」，走到了歷史的盡頭。像雅典城邦陪審團用「罪惡比死亡跑得快」底「功能性知識」宣判地球人類死刑，其結果只是雅典帝國滅亡、羅馬帝國滅亡……剝奪者被剝奪「像打去了黃的空蛋殼」。埃及法老早就用「金字塔—斯芬克斯之謎」為對岸「古希臘文明」鬼魂西行立碑：「開端就是沒落」。

高山仰止以觀滄海。

墨哲蘭識

引子

2006年10月，在北京大學外哲所講了三課：「『存在』漂移的四次重述」。

接著2010年出了兩本書：《西學中的夜行》與《偶在論譜系》。

17年過去，直到今天，我仍然奇怪為何我的文字也成了「無意指的指號」^[1]？

——為什麼《偶在論譜系》副標題是「西方哲學史的『陰影之谷』」？

——為什麼在「扉頁」題記「我是唯一一個逃出來向你報信的人」？

大家並不明白。

最後一場西式「交響樂」演奏完了，聲音如墮霧霾。

序曲 問題：憑什麼相信你？

主題 臨界：陰影之谷

展開 個案：偶在論分析

尾聲 懸置與回歸

落幕 啟蒙：落日前的憑弔

可現實中的啟蒙正進入更高潮，它還要翻過「更高的門檻」進到「古希臘亞里士多德阿提卡方言」……竟有如此西化跟隨的決心！「鄭聲淫」都搞不懂，早已死去的「阿提卡方言」還成為中國百年啟蒙後再啟蒙的先

[1] 「無意指的指號」借海德格爾用語，後覺不妥，我的本意是「以為意識實無意識」。它的呈現是「白日夢」或「逆向夜行」至今逐漸顯出而後知的。

決條件？

時序作祟，它正好堵在了我第三次對西方「自然理性」檢測與防禦的當口。

2017年11月，又到北京大學哲學系講了三課，開了一個對話會。

三課：

第一次啟蒙：功能主義

正置 希臘理性構造形而上學破物取力

第二次啟蒙：資本主義

倒置 猶太神性預設進化論作末日審判

第三次啟蒙：科學主義

合置 中國天道無極知白守黑以致中和

對話：

西方科學「為什麼是有而不是無？」

結論：

「人是政治動物」——「人是機器」——「人是基本粒子聚合物」
(古希臘功能主義)(近代英國資本主義)(現代美國科學主義)

進化論變成末世論——西方何以至此？

我把原來的題記「我是唯一一個逃出來向你報信的人」，換成了「人算命算不如天算」。因現實中同步的西方第三次啟蒙趨向了徹底去人化的「機器人第三型文明」——「罪惡比死亡跑得快」！^[1]

本書說了我能說的，立此存照而已。

[1] 蘇格拉底申辯說的是「死亡比罪惡跑得快」，因為蘇格拉底七十歲了又要接受死刑，「我去死，你們去活，誰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我之所以反過來用，畢竟人類的壽終正寢還遠得很，沒想到西方「功能性知識」的罪惡跑得比死亡還快，讓人類提前死於罪惡之中。才有此說。



上篇

對自然理性的檢測與防禦

準備：八步近前台階



在中國西哲界，我做的不是學問，是問題，而且在「逆向夜行」中，四十年如一日^[1]：

對西方形而上學檢測與防禦（80年代）

對現代性理論檢測與防禦（90年代）

對西方自然理性檢測與防禦（21世紀初）

西哲界，絕大部分是用西學的完美來定義自己學問的完美。

我卻無能跟隨，僅逆向夜行之：「你是世界的光，我卻在黑暗裏走。」

當然不能叫學問。做「學問」的人是好材料，比如是非常好的進口顯像紙，所以它能把西哲流派及大家的原貌完整地顯現出來，甚至還可以把自已代理的「東家」修飾得盡善盡美。

有少數西學學問家還原西學的真實——不是「真理」——不在此列。正是他們成為我的肩膀、我的借鑒，可以做問題。以此謹謝！

無疑首先，我是過了時過了氣的顯像紙，我顯影出來的相黑白不勻，還有脫落、殘缺、留白……用我這個顯相紙顯現的西方哲學及其大家面貌肯定沒有前一種顯相紙顯現得那麼光鮮。因而就啟蒙的「西學東漸」看、就體制的「學問標準」看，我做的當然不能叫「學問」了。「西學東漸」——人家來了，請人家來了，上座、尊位，豈能有訛！豈能冒犯！

但奇怪的是，西方從神學（神）到哲學（人）到科學（物）下滑的時間快得出奇——

「上帝死了」（17世紀）、

「哲學死了」（20世紀）

[1] 「逆向夜行」為何有這一特殊姿態？本卷只描述「是這樣」。「為何這樣」屬於第二卷「敘事卷」。

「人要死了」(21世紀)

不到「五世而斬」。這就使得我的顯現法「以史正論」的真實，比西方「以論治史」的「真理」更能將「毒死人的毒藥」顯現為歸根結底的真實！

本書就是將「自然理性」歸根結底毒死人的軌跡如此這般地、真實地描述出來。

下面且先用與本書相關的八步前設或「近前台階」做一近身鋪墊。



第一台階

如何重寫西方哲學史

或西方哲學史雙重遮蔽下的顯隱二重性 (2005—2013)

緒論

如果我寫西方哲學史，如何重寫西方哲學史？

有人會問：「你為什麼要重寫西方哲學史？」

有人還會問：「你憑什麼重寫西方哲學史？」

前一個問題我在展開中回答。後一個問題的回答也會在前一個問題的展開中連帶給出。其實道理很簡單，誰干預世界誰就得被世界質疑，否則你與我何干！有問題的人首先就獲得了重寫的必要條件。一個連問題都沒有的人——我指的是「根本性問題」——當然也就談不上「重寫」了。說它是「必要條件」，因為沒有它則根本不可能有重寫的意識——「無之必不然」，然後才是「有之不必然」——僅有重寫的意識，沒有重寫的能力，也枉然。

能力是個人的事情，意識卻關係到問題本身。我們必須首先面對它。

這個題目隱含的背景無疑是複雜的。撮其要者四。

(一) 東西文化各自思想或哲學形態都需要時間自身展開、轉折、輪迴。沒有長歷史段進入這種「輪迴」過程我們就無法診斷其興衰的命脈搏動……

(二) 中世紀後，「以體制用」的東方文化開始愈來愈強地遭遇「以

用代體」的西方文明的功能功利衝擊，一改獨立互補地相互吸收，不到四個世紀就西方獨大而逐漸侵蝕甚至剝奪東方而強行殖民化，變東方為西方「東方學」之「東方」。

(三) 強勢文明認為理所當然(「力量即正義」)。弱勢文化除了自己證明自己存在的理由，別無他途。但是，弱勢變強勢是進入同樣的「強力意志」走「剝奪者被剝奪」的歧路，還是走多元輝映獨立互補而回復到各自「本土人類學」之文化生態常路？如何診斷兩種「輪迴」的重疊？於是有了「猶太人問題與中國人問題」這一自設的歷史課題出現。

(四) 或許中國人可寫世界史，能「大而化之以致中和」的中國人，在東西正反遭遇的對照中，既重寫西方智能史(「以用代體」史)，也重寫東方智慧史(「以體制用」史)，即在總體上迷途指津：明辨「體用之分」「以體制用」，重建「神—人—物」的制衡關係：

既使敬神以節制人的僭越，又使馭物以抵制人的物化，使「人」允執厥中而扣兩端(「神」—「物」)地成「中和」之勢。

【附釋】

何謂「猶太人問題與中國人問題」？

這是我個人自設的課題。它的醞釀有幾個階段：

(1) 第一階段起因於「苦難」。兩個民族在各自的歷史中都是經受深重苦難的民族，但兩者對苦難的記憶與消化是非常不一樣的。猶太民族的「苦難記憶」如何能保持一個民族文化的神性品質，並凝聚為民族文化的自我認同，甚至把苦難中的堅守看作民族歷史品格的高貴性質，特別在知識分子(「文士」)中自覺如此。中國卻難能有如此不幸中之幸。這個感覺最先表現為「苦難向文字轉換為何失重？」，以八十年代為限。

(2) 第二階段轉向對「啟蒙」的態度。猶太民族在其民族性(「猶太性」)上是拒絕「啟蒙」的，這對「啟蒙的普世價值」無疑是一個否認。

中國「知識分子」^[1]不但放棄了民族文化認同的導師角色，還反過來幾乎整體性地向西方傾倒，把西方口中的「資本主義—普世價值」為自己的指導原則。

(3) 第三階段才最終涉及「文化種性」及其如何「復興」的問題。兩者都面臨兩難：

(3.1) 首先簡單解釋「文化種性」。

「文化種性」與「世界地形」上下息息相關。一如西方「地中海」及其上「希臘諸神」，界定其中的古希臘人「自然理性」即「功能性知識」，並作為開端一直影響到中世紀「基督教千禧年」^[2]及其後的歐美歷史。再如中東兩河流域及其上敘利亞神系中的「猶太教—一神耶和華」，界定其中的猶太人格守與神的舊約（《托拉》）之「猶太性」。最後如遠東高原兩河流域及其上的「道」界定其中的華夏民族「化極中和」的德性仁人，等等。所以，「文化種性」既是最高的信仰特徵，也是體現於下屬族群的人性特徵。

再談猶太人與中國人各自復興的兩難處境。

(3.2) 猶太人在二戰後面臨「猶太復國」的兩難選擇：靠人的理性建國即建立現代國家，則有悖與耶和華的契約（靠神性獲救）；若靠神性復國，又難以撫平二戰犧牲 600 萬人的傷痛和抵擋外族歷來的驅趕與屠殺。他們最後還是選擇了政治復國主義，建立了以色列國。（國家確立「神性主導」是後來的事。）

(3.3) 中國人在二戰後面臨「如何建國」的兩難問題，即「走什麼道路：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如果走社會主義道路，是走「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資本主義階段論道路，還是走「繼續革命論」完成社會主義道路？其實質仍然在於「西化 / 不西化」問題？

今天看來，兩個災難深重的民族在「復國」或「建國」的基業上都陷入了困境。所謂「民族復興」仍然沒有解決，或沒有徹底解決。

[1] 「知識分子」專指以西方功能性知識學為本位，因而根本否認中國文化民族認同，以致毫無責任能力的個人主義知識分子。

[2] 如前期普洛提諾底「柏拉圖主義」和後期阿奎那底「亞里士多德主義」。

如前所述，「文化種性」問題不單純是「文化類型」問題，它還界定了「人性」基本特徵。作為西方歷史開端的古希臘精神「知識即德性」其實就是以「真」規定「善」、以「力量」規定「正義」的「功能性知識」以及「優勝劣汰自然法」。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就是以「力量即正義」對「彌羅斯島人」進行種族清洗的。沒想到，「雅典帝國」很快滅亡了。以此類推，「羅馬帝國」滅亡了，「大不列顛帝國」衰落了，等等，「剝奪者被剝奪」。所以，法國哲學家猶太人德里達在《馬克思幽靈們》中說出了這樣的話：「西方歷史上空始終徘徊著三個幽靈：俄狄浦斯、哈姆雷特、馬克思。」

「幽靈」一詞德里達是借用馬克思《共產黨宣言》開篇「一個共產主義幽靈在歐洲大陸徘徊」的說法。但實際上，能「死的抓住活的」之「幽靈」，寓意「生死界限的抉擇與反諷」。莎士比亞《哈姆雷特》中的「幽靈」演化出「死，還是活，是一個問題」的名言——注意，「死活問題」不僅是抉擇，也是反諷，難就難在界限的兩難。^[1]

「俄狄浦斯」面臨的是「神／人」之間的界限：人究竟是屈服在神的詛咒中，還是走自己的超人之路？（這是古希臘尤其是中世紀後的西方人問題。）

哈姆雷特面臨的是「王權／人權」之間的界限：人究竟是聽任王權的篡奪，還是奪回屬己的王權？（「王權」影射著後來的「主權」。）

馬克思面臨的是「資本私有制／無產者」之間的界限：絕大多數無產者是忍受資本的剝削壓榨，還是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無產者共產主義社會？

19世紀下半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幽靈」東移到俄國和中國帶來了「社會主義革命」，特別喚醒了遠東的中國人。當西方人普遍沉入「以用代體」而科技物化道路時，中國人唯有借「生產力」之用做強做大自己，才能抵抗西方列強的遏制圍堵。所以，中國的崛起不能單純靠「資本技術」還必須靠中華民族的族群整體力量「以體制用」——即堅持「中體西用」彰顯中華民族的「德性之體」制西方「資本科技」之用，方能扶正

[1] 「反諷」，有時是當下兌現，有時在「凱歌般進行中」兌現，也有時會在根本上翻轉如「剝奪者被剝奪」「進化論變成末世論」等終極問題上兌現，這成為西方命運寫照。